

《秦俑·秦文化》丛书



郭淑珍 王关成

秦军事史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 新登字 004 号

秦俑·秦文化丛书

秦军事史

郭淑珍 王关成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2.125 印张 8 插页 533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419-8044-7/E·7

定 价: 50.00 元

读者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厂址: 长安南路陕西师大印刷厂 电话: 5240309 邮编: 710061

《秦俑·秦文化》丛书总序

本世纪 70 年代初期，中华大地西北黄土地上，几位农民用粗重的镢铧，揭开了一处古代宝藏。这便是后来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坑。由兹伊始，便掀起了一阵又一阵不大不小的秦兵马俑旋风。国外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纷至沓来。兵马俑的代表也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五大洲。截至目前，来兵马俑博物馆参观的中外游客已近 3000 万。以兵马俑命名的现代生活用品、食品也投入市场。古代优秀文化有力地冲击着现代文明，这种现象在许多古文化现象中还是不多见的。所以，有人便说这是一种“秦俑效应”。

“秦俑效应”的深层影响，还在于它对中华文化史的研究方面。首先进入秦俑坑考古工地的考古工作者们，从他们对秦俑坑出土文物的发掘和研究，最先公布了早期的研究成果。以后，研究家的视线由秦俑为出发点而旁及中国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艺术，几乎涉及到社会科学的所有门类。同时，还出现了不少的文学作品如诗歌、绘画、报告文学等。接着，又先后召开了五次学术讨论会，对秦俑的研究更加深入。于是，有识之士提出了把秦俑研究纳入秦文化的研究中去，扩大了研究的层面。这样，秦俑研究便与秦文化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更准确地说，秦俑研究因之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样的学术氛围，给这套丛书的编写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从学术界的大气候看也是一样。前几年兴起了一阵为时不短

的文化热。热浪过后，便是深沉的思考和更加细致而扎实的工作，从各个层次、各个角度、各个历史阶段来对文化史作深入的探索。秦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自然应该从多维视角中进行研究。这也是这套丛书应运而生的前提条件。

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虽然有不少前贤及后起之秀作了大量工作，但目前仍然是学术界的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这同中国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不合拍的。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目的，在于为文化史的研究作些敲打边鼓的工作，在这里，我们同其他文化史研究家一样，同样遇到的是对文化的理解及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的问题。从克莱姆、泰勒奠定的文化人类学开始至今，关于文化的定义有的学者统计已达160多个，歧义横生的文化定义，自然给予我们一个难为的选择。我们还是选择了关于文化史的研究，应该把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就都作为研究对象这样的观点。人类的一切活动，既是思维过程，又是实际创造过程。这两方面互为表里。我们只能把物质文明的创造过程当做研究的基础，才能使精神文明的创造过程的研究成为客观合理的概括。考古发掘出的古代物质文明的创造，成为我们认识古代文化进程的重要依据，便说明了这一点。秦兵马俑、秦陵铜车马，既是秦代的物质文化的创造，也是秦代精神文明创造的反映。不少学者依此来论证秦代的社会文明，填补秦代文化史的多处空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秦陵列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清单，也说明了这一点。基于这种看法，我们在选题中，既包含了物质文化，也包含了精神文化。

这套丛书是由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和秦俑学研究会秘书处合编的。全套约30本，拟在5年中完稿。丛书改变了其他丛书的划一面目的编辑方法，结合着秦陵秦俑的旅游及为了扩大读者范围，而将一些旅游者有兴趣的、可读性强的、内容健康的选题，

也列入其中，所以整个丛书，又有不同的层次、适应更广泛的读者层面。

参加丛书编写的是由老、中、青结合的作者队伍。他们的写作态度是认真的。读者们看到了他们的著作，便会感觉到这个特点。虽然他们热切地想将自己的全部知识和才华都奉献给读者，但因为学识、阅历、经验、水平等原因，在各本著作中也可能程度不同地会有一些错误和不足之处，我们诚恳地等待着读者的批评和专家同行的指教。

我们对为这套丛书出版付出了艰辛劳动的作者及工作人员表示热忱的慰问，对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领导同志的支持、鼓励和帮助，表示由衷的谢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及同志对这套丛书的出版作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也值得我们铭记和感谢。

《秦俑·秦文化》丛书总编撰委员会

1999年10月

第一章 春秋时期的秦国军事

第一节 春秋军事形势概述

春秋^[1]是继夏、商、西周时代之后的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即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由盛转衰、新兴封建社会逐渐孕育的时期。根据多数史学家的看法，它起自公元前 770 年，其标志是周平王东迁洛邑；终止年代有公元前 475 年、前 468 年、前 453 年、前 403 年之说。本书同意陈恩林先生的观点，认为公元前 453 年说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2]。这一年，晋国的韩、魏、赵三家灭智伯而分其地，形成了事实上的三个诸侯国，战国七强格局初步确立。

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论及春秋形势时说，是时诸侯

“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

这样的概括的确反映了春秋时期的时代特点。

春秋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长足发展，当年周王室所分封的大部分诸侯国都迅速发展强大起来，尤其是处于周边发展空间较大的几个诸侯国。相反，周王室自从东迁洛邑以来，地位却一天天在下降，于是，各大国诸侯就争相迭起，争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权。后来更有甚者，卿大夫专国政，陪臣执国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在不断地进行着大分化、大改组，中国古代社会就是在这种激烈震荡的形势中向前发展，新的封建制的因素也是在这种频繁激烈的争霸战争中孕育成熟。

从军事领域来看，春秋时代主要有以下变化：

一、周天子的一统天下瓦解

春秋以前，周天子是天下共主，是全国的最高军事统帅，所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3]。春秋以降，礼乐征伐变为“自诸侯出”，昔日那种以周天子为最高军事统帅的三级领导体制（天子—诸侯—大夫）亦即宣告瓦解。

据史载，中国古代在西周以前的夏、商时代实行的都是松散的中央集权制。当时，夏、商王畿之外，氏族部落林立，它们各自独立为政，对中央王朝时叛时服，随其强弱而定。当中央王朝强大之时，它们就向中央王朝纳贡称臣，当中央王朝势力衰弱之时，它们就背叛中央王朝。所以，夏、商之王，虽有天下共主之名，但无共主之实。周灭商后，为了统治东方广大的区域，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宗法制基础上的分封制度^[4]，大封亲戚功臣到全国各重要战略地区，作为周王室的派出机构镇守一方，是为诸侯。诸侯再将封地按亲疏关系分封于卿大夫，是为下一级政

权机构。实行分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卫周王室，巩固其统治，也即《左传》一书所云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5]。周初，这样的封国就有数十之多，所谓“昔武王克商，包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6]其后直到西周末年周王朝都代有分封。周除了大封功臣以外，还对帮助周打天下的四方诸侯进行分封，他们主要是远古流传下来的黄帝、尧、舜、禹的后裔。周皆赐之以封号，使其保持原有的地盘，维持原有的统治。

在分封制下，周天子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下共主：有权巡狩四方并对诸侯实施赏罚，接受诸侯交纳的贡赋，决定诸侯建军的规模以及战时征调诸侯国军队随王室出征等。而受封诸侯则是周天子设在全国各地的政权机构，他们在政治上隶属于周天子，有义务向周天子述职、纳贡、助祭并在战时听从王命、服从调动。分封制作为西周重要的政治制度使西周维持了三百余年的统治。到西周末年，各重要封国如齐、鲁、晋、燕、楚、郑等已发展成为同西周政体相似的政治经济大国。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由于地狭国小，地位一落千丈，遂逐渐丧失了控制四方诸侯的能力，其天下共主的地位也受到了严重地挑战。

周天子王权衰落的直接后果是各诸侯国纷纷脱离周王室的控制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并开始走上独步发展的道路。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不平衡，当最高政治权力中心发生动摇之时便为大国争霸创造了条件。

二、“尊王攘夷”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争霸战争

春秋时代是中国古代战争最为频繁的时期之一。据专家统计，春秋三百多年的历史，军事行动就有四百八十三次之多，其中较大的战争有三百八十四次之多^[7]，战争的类型既有中原华

夏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有中原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特点是大国争霸。

春秋初年，各诸侯国实施战争的对象主要是其周围弱小落后的少数民族方国部落，后来更其甚者，同姓诸侯之间也开始了强并弱大兼小的战争。史载，周初封国，“千有八百”，至春秋初年仍有一百五十多个^[8]，但到春秋中期以后，中原大地就只剩下了十几个大国诸侯和数十个夹侧其间的小国诸侯，如齐、鲁、晋、郑、宋、秦、楚、卫、陈、吴、越等等。在诸侯大国的周围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方国部落，由于地理形势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发展的不平衡，齐、晋、楚、秦诸国在春秋列国中兼国最多，实力最强，由是强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就成为春秋时期军事历史的特征之一。但是各大国实力虽强，在整个春秋时代，还没有一个诸侯大国能取代周王室的政治地位。列国诸侯在进行兼并战争时，打的都是“尊王攘夷”的旗号，并在此旗号下进行掠土开疆，等到各自实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开始争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主权力。在春秋历史上，齐、楚、晋、秦、吴、越诸国都曾先后成为霸主国。

三、争霸战争与列国普遍地扩军备战

春秋中期以后，列国普遍地进行扩军备战，或为了积蓄争霸战争的实力，或迫于战争形势的压力。本来按照《周礼·夏官司马》的规定：“凡制军万有两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春秋中叶以后，各诸侯国则不管领地大小，爵位高低，都开始建立三军、六军的编制。而扩军备战更加剧了大国争霸战争的频繁激烈程度。

为了适应争霸战争和扩军备战的需要，中原各主要诸侯国在春秋中期以后都相继进行了一场军制改革，其中晋、楚两国争霸

时间最长，军制改革也最频繁，如晋国：“作爰田”、“作州兵”^[9]，楚国“书土田”、“量入修赋”^[10]，郑国“作丘赋”^[11]，鲁国“作丘甲”^[12]等。改革的本意是为了扩大兵源，增加军赋，但它同时却引起了各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这是各国统治者所始料未及的。这场由军制改革引起的社会变革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以后。从此，奴隶制社会逐渐为封建制社会所代替，而新一轮的兼并战争又在战国时期拉开了帷幕。

四、春秋秦军事形势简述

秦立国于春秋初年，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洛邑时，秦襄公因勤王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始建国。

秦从襄公立国到春秋战国之交的厉共公时代，共有十九位国君在位，根据史料的记载并参考有关学者的观点^[13]，我们把春秋时期秦国军事形势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时当春秋早期，从襄公立国（公元前 770 年—公元前 766 年）到德公时期（前 677 年—前 676 年）共九十三年。其间秦文公（前 765 年—前 716 年）在位五十年；秦宁（宪）公（前 715—前 704 年）在位十二年；秦出公（前 703—前 698 年）在位六年；秦武公（前 697—前 678 年）在位二十年。

此期是秦为争夺生存空间、扩大地盘而战的年代。秦襄公立国后，接受了周天子口头上的封爵与封土，为了实际占有这片土地，秦人与戎人争战了近百年，几经迁都，终于在当时中国的西部（今陕西省关中西部）站稳脚跟，并开始迅猛发展。

第二阶段时当春秋中期，从宣公（前 675—前 664 年）即位到桓公时期（前 603—前 577 年），积近百年。其间秦成公（前 663 年—前 660 年）在位四年；秦穆公（前 659—前 621 年）在位三十九年；秦康公（前 620—前 609 年）在位十二年；秦共公

（前 608—前 604 年）在位五年。

此期是秦为争夺霸权而战的年代。时中原的形势先是齐、楚两强争霸，后为晋、楚争霸。秦僻处西方，到穆公时已经积聚了一定的实力，且穆公与齐桓公、楚成王、宋襄公、晋文公都是同时代的人物，所以也有称霸中原之志。他在位期间，重贤举能，厚施于民，扩军备战，以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并重战略，向东，把晋人势力驱逐出河西（黄河以西、洛河以东、梁山以南、渭河以北地区），惟进一步图谋中原时遇到晋的阻扼，不得已向西发展却取得了“并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14]的重大胜利；东南与楚争战于武关（今陕西省商县东南）之外，推动了秦人势力的南下。穆公之后诸公为保护穆公东进战果与晋争战河西、河曲数十年，终因力不敌晋而失利。

第三阶段时当春秋晚期，从景公即位（前 576—前 537 年）到厉共公在位中期（前 453 年）共百余年。其间秦哀公（前 536—前 501 年）在位三十六年；秦惠公（前 500—前 491 年）在位十年；秦悼公（前 490—前 477 年）在位十四年，秦厉共公（前 476—前 443 年）在位三十四年，其中公元前 453 年以前为春秋时期。

此期仍是秦为巩固保卫穆公东进西伐成果而战的年代。时中原的形势仍是晋、楚两强争霸，秦利用晋、楚矛盾联楚以制晋，有力地遏制了晋国向西攻伐的锋芒，并始终保有穆公东进所夺得的河西之地。春秋后期秦助楚击吴，充分显示了秦国的实力。春秋战国之交，秦国国力继续增强，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大，先后有蜀人、楚人、义渠、晋人“来赂”^[15]，向秦进贡财物，表示礼敬。

襄公立国之初，秦大概只有一军的编制，当时沿袭周制称师。至秦出公时（前 703—前 698 年）已有左右师旅，即左右两

军的编制^[16]。穆公时期（前 659—前 621 年），秦已和中原诸侯国一样有三军编制即左、中、右三军。大概到春秋晚期秦国一直保持三军编制。秦依靠这支武装力量成为当时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奴隶制军事强国，并在当时的战争舞台上活跃了近三百余年。秦地东到黄河与晋为邻，西北到泾水上游（今甘肃省的平凉一带）与义渠戎为邻，西南与巴蜀，东南与楚为邻。秦统一了西北广阔的地区，促进了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为中国以后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第二节 秦人早期历史简述

秦人远祖曾是华夏民族的一支。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是时秦人尚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大业娶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大费曾“助禹平水土，有功”，帝舜赐姓为嬴氏。此时秦人已从母系氏族公社过渡到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大费的子孙大廉，若木……费昌当夏桀时，去夏归商，大廉玄孙孟戏，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中衍之玄孙曰中湣，“在西戎，保西垂”，受到殷商统治者的信任，被封为诸侯，替殷商镇守西部边境（商朝王畿西境在今山西省和河南省西部一带，其势力范围已达今陕西省西部）。中湣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伐商时，并杀助纣为虐的恶来，从此秦人地位下降，沦为周人附庸被周强迁至周之西境（今甘肃省天水一带）替周王室守卫边陲。后来秦族中的季胜一支（蜚廉的次子）因受到周成王的宠幸，其后裔被封于赵为赵氏；而另一支恶来之

后裔即恶来生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就开始居于西犬丘（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礼县）。大骆传位嫡长子成，其次子非子为周孝王养马于汧渭之间（今陕西省宝鸡市西，渭水与汧水的会合处），因其主持马政工作有功，“马大蕃息”，周孝王欲使非子继承秦族宗脉，遭到嫡子成外祖父申侯的反对。申侯告诉孝王说：“从前我的祖先娶了郿山氏，生了女儿嫁给仲衍的曾孙戎胥轩为妻，生中湣，因与周相亲而归顺于周，保护西垂，西垂因而和睦。现在我的女儿又嫁给大骆，生了嫡子成。申骆联婚，西戎都归服，所以你才能称王。”周孝王于是改封非子于“秦”地（其地望在今甘肃省天水地区清水县之秦亭，或说在该县西之育故亭），使其“复续秦氏祀，号秦嬴……以和西戎”，也不废申侯外孙成的嫡嗣地位，使其安抚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生公伯，公伯生秦仲，时当周厉王时期。厉王无道，西戎反叛周王室，灭掉了犬丘大骆嫡子成这一秦族。周宣王继位后乃以秦仲为大夫，使其率兵伐戎，戎人杀秦仲。秦仲有子五人，长子庄公嗣立，周宣王又授其兵卒七千，使庄公继续讨伐西戎，这次秦伐西戎大获全胜，于是周宣王乃“复与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庄公有子三人，长男世父不立，让位与其弟襄公，这便是秦的开国之君一秦襄公。

黄留珠先生说，自女修至大骆是秦族历史的传说阶段，此期秦人祖先过着以畜牧为主的游牧生活，以调训鸟兽即“善御”见长。自非子至庄公，是秦族历史的实证阶段^[17]。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及北京大学考古系师生在甘肃省天水地区甘谷毛家坪和天水县董家坪，已经发现了属于西周时期的秦文化的遗存，从而向我们揭示了西周时期秦文化的某些基本特征^[18]。秦人是在伐戎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由于地处周室西部边垂，在西周末年西戎反叛周王室的动乱年代里，秦人首当其冲受到戎人的虏掠，故为

了周王室也为了秦人自己的生死存亡而不得不与戎人少数民族展开了长期的战争。自秦仲立，秦人事实上已接受了周王室赋予的征伐诛杀大权，秦人也在伐戎战争中发展壮大。《史记·集解》毛诗序曰：“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也”。秦仲领导秦人经过二十二年艰苦卓绝的征战，最后死于疆场，说明西周末年戎族势力之盛。庄公继承父辈遗志伐戎并取得重大胜利。青铜礼器“不其簋”^[19]铭文对庄公伐戎一事有较详细地记载。铭文记述西周末年猋狁“广伐西俞”，周王命伯氏率兵伐戎，伯氏和不其在高陶与猋狁展开激战，获得胜利，即“多擒，折首执讯”。因不其作战有功，周王赏赐他“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郭沫若先生考证“不其簋”为西周末年秦器，不其即秦庄公。“伯氏”，王国维疑为不其之父，也可能是秦仲。根据“不其簋”铭文，我们可以说，秦庄公时秦人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至襄公继位后，秦人已有了自己的军队，到了建立国家前夜。襄公继位七年后正式创建秦国，其时正值西周末年。

有学者说：“秦建国前后颇有作为的秦人首领有三，一是非子，秦之称秦，实始于非子。二是庄公，庄公为父报仇，受周宣王遣，与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与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三是襄公，襄公为庄公次子，受其兄世父让，为太子继位。襄公时秦方为诸侯，故秦首领称公应始自襄公。”^[20]其论是也。

第三节 秦人的崛起与兴盛

西周的衰弱始自懿王（前 915—前 891 年），《史记·周本纪》曰：“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至夷王时（前 877—

前 865 年)，国势进一步衰落，《后汉书·西羌传》引《古本竹书纪年》曰：“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厉王时期（前 864 年——前 842 年），形势更加恶劣，史载厉王暴虐，信谗远贤，民多怨。西北之戎，东南之淮夷趁机起兵反叛王室，寇掠王土；加之旱灾连年，人民流离失所，社会动乱不安，西周王朝在内忧外患交侵之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厉王也终于在国人的围攻之下流亡于彘（今山西省霍县）。其后周公、召公共同执政，史称“共和时代”（前 841——前 828 年）。十四年后，厉王死于彘，其子宣王即位（前 827——前 782 年）。宣王以周、召二公辅政，大修文武之业，重振周昔日雄风，史称“宣王中兴”。但好景不长，宣王死后其子幽王即位（前 781——前 771 年）时，天灾人祸又纷至沓来。幽王好信谗言，重用奸人，使西周政治又趋于腐败。幽王二年，关中发生旱灾，旱灾之后又是地震，所谓“三川（泾、渭、洛三水）竭，岐山崩”^[21]，西戎也不断内侵，西周王朝又一次面临崩溃的边缘，在此国难当头之际，幽王不思修政，反而听信“善谀好利”，“为人佞巧”^[22]的虢石父之言，废申后及太子宜臼，立宠妃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从而引发了一场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王位之争，埋下了西周灭亡的种子。其后为博美人褒姒一笑，又演了一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结果，当宜臼的外祖父申侯联络缯侯、西戎攻伐王室时，幽王点燃的征兵烽火再也不灵验了，诸戎杀幽王于骊山脚下（今陕西省临潼县），趁机房掠周室财宝而去，西周于是宣告灭亡。

周幽王死后，关中地区的形势一度十分复杂，曾出现二王并立形势。《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文曰：“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郟鄏。”《左传》正义引《竹书纪年》云：“先是申、鲁侯、许文公

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当为晋文侯）所杀，以本非嫡，故称携王。”《国语·晋语》云“褒姒……与虢石甫比”，知虢公翰即是与褒姒朋比为奸的虢石甫。

周平王即位后，眼见得关中山河已支离破碎，于是在申、许、晋、郑、秦等诸侯的拥戴下迁都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其后历史进入东周也即春秋时代。

周王室东迁后，王畿狭小，从此势力转弱，遂渐渐失去天下共主地位，开启大国争霸时代。

一、襄公受封，草创秦国

秦襄公即位于周幽王末年（周幽王五年，前 777 年）。即位次年，他为结好于周，即嫁妹于丰王（姬姓之王）^[23]。当幽王八年西戎攻伐王室时，襄公毅然起兵赴京勤王。有学者说，襄公妹所嫁之王实为周幽王的次子伯服，所救之周也是周幽王及其新立太子伯服。但当周幽王及伯服死后，西周又有申、鲁、许侯所立之天王（周平王）与周室奸臣虢公翰所立之携王，秦襄公审时度势，决定拥戴周平王为周王室的正统代表人物，“他所要利用的是周王室的传统威信而并不拘泥于秦与幽王、伯服的旧有关系，特别是幽王、伯服死后他更没有必要与周王室的正统代表人物天王相敌对”^[24]，于是在周平王迁都洛邑时，秦襄公又决定以兵护送平王东徙。

周平王很清楚关中山河已被戎狄攻占殆尽，也落得送秦人一个空头人情以褒奖秦人护驾之功。《史记·秦本纪》曰：“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并说：“戎无道，侵夺我岐西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遂与秦襄公盟誓并“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

周平王给予秦人的只是一个口头上的许诺，但秦人所缺少的也正是周王室的封爵与封土，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有了周天子的正式封赐，那么秦人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行使周天子所赋予的征伐诛杀大权。事实上周初所封诸侯如齐、晋、鲁等国无一不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从这一点上说，周天子的封赐是大大提高了秦人的政治地位与国际地位，也为秦国的发展和崛起提供了机遇。至于以后如何发展，那就要视秦人自己的努力程度而言了。

襄公立国后，军事斗争的主要任务是整顿武备，东征伐戎，把周平王的口头许诺变为现实。当时关中的情况是，周王室东迁以后，从陇东到关中，也即整个渭水流域到处散居着大大小小的戎人部落。《后汉书·西羌传》曰：“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獯、邶、冀之戎，泾北有义渠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扬拒、泉皋之戎，颖首以西有蛮氏之戎。”另外在当时西周王畿之内，还有一些夏、商、周贵族后裔所建立的方国如夏后氏之彭戏氏，商之荡社、芮国，周之小虢、郑以及嬴姓之梁国等。秦人要在周人故地站稳脚跟，建立政权，非得经过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不可。

为了便于东征伐戎，襄公于即位次年把都城从西犬丘迁往汧邑（其地在今陕西陇县边家庄附近的磨儿塬），这是秦人东出陇山所修建的第一个战略据点。

秦襄公为伐戎所做的另一件事是积极整顿武备，大力开展练兵活动。

《诗·秦风》中的《驺铁》篇真实描写了秦人驾车狩猎的盛大场面，所谓“驺铁孔阜，六轡在手，公王媚之，从公于狩……”，这首诗实际描写的是秦襄公借狩猎进行的一场军事大演习活动。诗《小戎》描写了秦人准备战车、甲兵征伐西戎的实况，诗曰^[25]：